

# 朱军的“艺术人生”

文 / 图 海南日报记者 王勇

屏幕上的朱军，感情充沛细腻，善于以情动人，经常让观众和嘉宾潸然泪下，由此也获得“催泪朱军”的称号；屏幕下的朱军，低调内敛，多才多艺，书卷气的外表下包含着一颗硬汉的心。

继 2004 年的《时刻准备着》之后，去年底朱军的第二本书《我的零点时刻》出版。2012 年 2 月 25 日，朱军携新书到海口与读者见面，海南日报记者借此机会走进了朱军的“艺术人生”。

## 关于书籍

海南周刊：写《我的零点时刻》初衷是什么？

朱军：主要是对过去进行梳理，主持了 15 年春晚，又恰逢自己的第 4 个本命年，想进行阶段性总结。

如果说当年《时刻准备着》还有些许功利，还想追逐生活当中所想追逐的所有机会的话，那到了 48 岁，心态就趋于平和，觉得要珍惜眼前，珍惜一路走来的朋友，珍惜跟我们相亲相伴的亲人。

其实，我就是抱着坦诚之心来写，不矫情不故作。如果在读书过程当中，大家通过这本书能够多多少少有一些启示的话，那将是我莫大的荣幸。

海南周刊：这本书讲了很多“内幕”，比如在兰州工作两头拿“工资”，比如您第一次上春晚接受了朋友工厂免费的礼服等，那么您的书去年 12 月出来后，有没有因此遭受过异议？

朱军：到目前我还没有听到任何非议，相反很多读者、观众能够通过这本书全面的认识我、了解我。

长期以来，大家都是通过屏幕来“看”我，由于距离的原因，揣摩、猜测甚至误判的都有，我把真实的经历讲给大家，大家反而都理解了。

## 关于过去

海南周刊：怎么评价自己的过去？

朱军：自己对自己的评价真的不重要。我只能说，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努力，努力工作好生活好，没有做对不起良心的事，没有丢人现眼，还能为社会做一些有益的事。

海南周刊：如何看待关于 2004 年春晚零点报时的“黑色三分钟”和“过于配合”的质疑声？

朱军：所谓“黑色三分钟”，我首先要说的是远没有想得那么严重。首先，我们没有打架，也没有吵嘴。在那一刻，大家也没有觉得谁要在那一刻抢占风头。实际上大家的出发点非常好，但是因为缺少协调，相互之间都想往一个点上使力的时候，就撞车了。

我最怕别人说我虚伪，“过于配合”事件让很多人怀疑我的人格，有一段时间我确实很郁闷。但是我之所以没有站出来说，是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，其实愿意理解你的人，你不说他也理解你；不愿意理解你的人，你说死了他也不理解你。又何必呢？

## 关于现在

海南周刊：现在的工作状态和生活状态，是您期望的理想状态吗？

朱军：我有一个陪伴我 20 多年的太太，今天依然漂亮；我有一个跟大家一样的独生孩子，我的儿子朱思潭，他并没有因为所谓的优越而有什么不好的习惯，相反他是一个特别善良的孩子；虽然我的父母已经较早地离开了这个世界，但是我现在跟我的岳父生活在一起，我仍然感受着一家三代的快乐；我在自己的工作平台上还可以得心应手，还可以有什么想法能够得以实施和展现；我还没有有一种老年的心态，我觉得我还有很大的劲要付出。

海南周刊：您有各种职务和头衔，你更喜欢哪种身份？

朱军：主持人是我的职业，我的饭碗；我的本质工作，我必须把它做好。

至于社会给予的全国政协委员、公益大使等，你在这个平台上，大家给了你这么多关注，这是你应尽的义务，也必须做好。

海南周刊：对今年的春晚您有什么要说的？

朱军：每一个春晚的参与者，都想把最好的效果呈现给大家。但由于这台晚会太受关注了，观众地域不同、年龄不同、文化层次不同，确实众口难调，想让大家百分百满意不可能。

作为春晚的参与者，只能是努力做到贴近生活，贴近真实，给大家在年三十带去多一点的欢乐。

海南周刊：《艺术人生》遇到瓶颈了么？

朱军：坦白地说，《艺术人生》与她最辉煌时期相比有一定差距，但她仍是一个高收视率的节目。

《艺术人生》已经播出 12 年了，观众出现一些审美疲劳，同时节目也存在缺少嘉宾的情况。

我们目前也正在找新的突破口，希望在节目内容上再下功夫，要在节目中真正把艺术家偶然成功背后的必然呈现给大家，《艺术人生》一定会“老树开新花”。

海南周刊：您一年主持 100 多场晚会，还要做很多节目，还要写书，您是如何分配时间的？

朱军：我要特别感谢部队，我从 16 岁多一点当兵，那个时候就养成了一个习惯，不睡懒觉，时间观念强。

我经常跟朋友这样说，不要推托自己没有时间，没有时间是因为你没有把这件事儿当成这个阶段最重要的事情做。

很多人说最近这段时间都没有时间去看自己的父母，那是你真的在心里没有把自己的父母当成最重要的。我相信当成最重要的时候，你就有时间了。怎么会没有时间呢？跟朋友少聚会一下，少干点闲事，说少点闲话，不就有时间了吗？我的书就是这么写来的。

海南周刊：您是如何定义幸福的？

朱军：每个人对幸福的定义不一样，我认为心里踏实、亲人相拥、朋友不弃、有一份事业就是幸福。

成功不一定幸福，幸福一定是成功的，做人内心感受很重要，我现在就很幸福。



《印度理工学院的精英们》封面

提起印度，多数人是会想起电影《流浪者》和《大篷车》。殊不知从 1990 年代开始，印度正在通过异军突起的软件业正在逐步获得世界的尊重。正如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·弗里德曼在畅销书《世界是平的》一书中说的：“二十年前，印度还因驯蛇人、贫困、特瑞莎修女著称。而如今这是个充斥着聪明头脑与电脑天才的国度。”而鲜为人知的是，创造印度软件业奇迹很大程度上与一所名为“印度版麻省理工”的高校——印度理工学院 IIT 的培养模式的有关。硅谷的 20 万的印度裔高科技移民多数毕业于此。2010 年 12 月出版的《印度理工学院的精英们》(桑迪亚·德布著、黄永明译，北京大学出版社)一书，对如何用较小的成本构建世界一流大学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。

看过印度电影《三个傻子》的观众都不会忘记电影中虚构的“皇家理工学院”，其实，印度理工学院就是他的原型。在印度乃至全球，印度理工学院都能称得上是一个现代神话。在一个文盲还占多数的国家，居然有一所能媲美哈佛和麻省理工学院的高校，简直不可思议。2006 年《泰晤士报》全球大学排行榜上，印度理工学院名列前 50 名，工科排名全球第三，仅次于麻省理工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。美国《商业周刊》说得更直白，他们直接把印度理工学院的毕业生誉为“印度史上最热门的出口产品”。美国《新闻 60 分》节目曾经评价说：“印度理工学院在印度的地位相当于把哈佛大学、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加起来在美国的地位。”在 1990 年代，硅谷中处于创业期的公司大约有 10%是由 IIT 毕业生创办的；总部设在美国的世界 500 强企业里，几乎所有世界跨国公司的管理层中都有 IIT 的校友。而 IBM、惠普、甲骨文、微软、思科等著名企业更在该校设有专门办事处，以便最快速地招揽优秀人才。

《印度理工学院的精英们》一书作者系印度著名专栏作家，毕业于印度理工学院克勒格布尔校区，曾任印度最成功的杂志 Outlook 的编辑，印度新锐新闻周刊 Open 主编。作者花费了 14 个月的时间，访遍全球成功的印度理工学院的成功校友，为我们展示了印度理工毕业生各个精彩的侧面。本书作者试图解释：这所在 20 世纪 50 年代才建立的学校，如何快速成为一个光芒耀眼的传奇品牌？在本书调研过程中，许多在印度和在美国的印度工人都坦率地承认：“若不是我曾有过在印度理工求学的经历，我不可能成为今天的我。”正如作者所言：“我要说的是印度理工学院不仅仅赋予你世界级的理工背景，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给予你一种美妙而多样化的通识教育，这种教育让印度理工人为今后在任何领域取得成功做好了准备。”

书中一个发人深省的观点就是，印度理工获得如此成就既不是先进的课程安排，也不是国外教学援助，而是其自身的组织结构。1956 年，印度国会就通过《理工学院法案》，它使学院有很大的自主权，在很大程度上躲过了官僚体系的干涉。印度理工人能够完全自主的选择教学大纲和方式。用一句印度政府官员的话说就是：“政府只是把它建了起来，然后就撒手不管了。而那些政府撒手的领域，基本上都做得很出色。”这实际上与民国时期的北大、清华、西南联大的教授治校有异曲同工之处。

该书也披露了一些事实，值得我们深思。印度理工学院难考，在世界是出了名的。但更可贵、可怕之处在于，它的录取从来就是六亲不认，根本不存在通融之道，一切凭成绩。上至总理的儿子，下至校长的女儿，不论是谁，想进该校，考试成绩一定要排在申请人的前 2%，至于面试，更要走公正透明的渠道。被誉为“印度的比尔·盖茨”的 Murthy，他创立了印度的软件巨头 Infosys (世界 500 强之一)。Murthy 的儿子想报考 IIT 的计算机专业，却被无情地拒绝，结果被美国的常春藤名校康奈尔大学录取。

不可否认，印度理工的存在也无法改变印度一些社会痼疾，但他毕竟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对印度的看法，并获得了尊重。当我们去年新创立的新锐大学南方科技大学还在争论是否“去行政化”纠结时，喜马拉雅山背后的这个国家 50 多年前就在举全国之力，推动世界一流理工大学，不动声色培养了数十万名与国际接轨的精英，为印度成为软件强国奠定了基础，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。

# 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神话

## ——读《印度理工学院的精英们》

文 / 海南日报记者 陈岚桦

朱军在海  
口与读者  
见面。

